

STRATEGY 2012

战略

第一辑

李慎明

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
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

余永定

勿忘“美元陷阱”

张维为

告别政治浪漫主义——关于中国改革的若干思考

张文木

2011：中东动荡与世界变局

尚智、反智与“文化团体”国家构想

韩毓海

朴素的政治，朴素的文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

STRATEGY

战略

第一辑

春秋研究院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略. 第1辑/春秋研究院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7-208-10561-4

I. ①战… II. ①春… III. ①战略学—文集
IV. ①C9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0601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于力平

封面装帧 零意

战 略

(第一辑)

春秋研究院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c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苏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2.5 插页 4 字数 280,000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0561-4/D·2043

定价 38.00元

目 录

前言

1 战略的最高境界是战略方向

思想

5 李慎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本文详细梳理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实践。作者认为，毛泽东多次提出的“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表述，就是这一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作者也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做出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作者强调一定要高度重视、坚决维护《决议》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准确、正确的评价，并且指出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迄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访谈

39 余永定/勿忘“美元陷阱”

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过程是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的自我否定过程。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经济的不平衡，特别是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分别是中国执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演变的三个阶段的核心词。中国现在已经深陷国际金融危机的漩涡，我们的选择可能已经不多，但办法总还是要想的。不管美国人说什么，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的利益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专论

53 张维为/告别政治浪漫主义 ——关于中国改革的若干思考

中国改革模式的特点是“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相对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过去二三十年中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诸多变革模式中最成功的一个。接下来的政治改革首先就是摆脱西方僵化的政治话语的束缚，特别是所谓“民主与专制”话语的束缚，以稳健和渐进的方法为主，从中国的国情和民情出发，最终实现对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

60 贾根良/我国推迟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战略构想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不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将更有利于我国根本的和长远的国家利益。如果因为我国政府在加入WTO时做出了承诺，那么也应该尽量拖延加入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国应该通过体制改革，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统一国内市场，大力加强购买国货的爱国主义教育，整顿政府采购市场，改革和完善政府采购市场体制和政策，健全相关法律和法规，以避免遭受重大的利益损失。

70 李世默/向G20演说：全球化2.0——利益一致，模式各异

全球化2.0的核心是文化的主导性，并作为文明的基本要素：每一种文化和文明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应该被视为公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神明”足以统合各种文化和文明，或创造出什么普世性。不同文化的存在都是单称（非对称性）的，其差异是无需理由的，在根本上是没有可比性的。（用中国人的话说）只有“存异”才能“求同”（承认并尊重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才能实现利益的一致），才能建立更和平的世界秩序。这就是基于多元性的全球化2.0的故事。

年度报告

75 张文木/2011：中东动荡与世界变局 ——兼论中国应对方略

2010-2011年影响中国安全环境最大的事件是美国重返亚洲和中东动荡及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行动。这说明欧盟和美国有了在抛弃雅尔塔体制并新的基础上建立欧美共治世界体制的战略意图。在苏联解体和欧洲接近完成统一后，美国便将战略重心移向亚洲，其目标就是中国。作为回报，利比亚之后的欧盟也将会在远东，尤其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保持相当程度的合作。美国与欧盟正在进行着新的战略分工和利益分配，世界力量正在进行重组。对中国而言，真正的挑战正在来临。

历史

.....

161 刘小枫/尚智、反智与“文化团体”国家构想

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第一代中的佼佼者，在国共鼎革之际，他没有像他的朋友、弟子那样选择或者去香港，或者去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这看起来多少有些难以理解。但刘小枫的解读恰恰证明，对熊十力而言，这是一个再合理不过的选择。因为熊十力本身就是革命家，他不但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运动，即使后来转攻哲学，也仍然是“用哲学搞革命”。他批评韩非是极权主义者，因为韩非“反智”。在熊十力看来，韩非与儒家的区别在于，儒家认为“人人皆有佛性”，皆可学哲学，而韩非认为普通人根本搞不懂也没必要学哲学。由此，熊十力阐发出了儒家的自由民主精神。

167 韩毓海/朴素的政治，朴素的文明

中国式民主的一个核心，就是平等、民生，是基层人民广泛参与政治和政策制定，而这就是努力追求实质的民主，我们称为群众路线。走群众路线，不是说群众只有通过选举仪式才能参与，而是在基本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始终要遵循民意，始终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始终遵循“自下而上”的原则，关键是：始终要求政策制定者走下去，到基层人民群众中去；因此，“群众路线”要求的人民参与是日常性的，而不是仪式性的。它选的是公共政策，不是政治明星。

书评

.....

179 达巍/读基辛格《论中国》

基辛格在其2011年的新著《论中国》中，时而像一位学者，用中国传统的文化因素来解释当代中国领导人的战略与政策；时而又热衷于回忆甚至炫耀自己与中国四位领导人的交往细节；最后，基辛格则显现了他作为战略家的视野——中美要走出历史上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宿命，建设“太平洋共同体”，并在其中“共同演进”。

186 严荣/应对美国金融压力的历史镜鉴

弗朗西斯·加文在其最新力作《黄金、美元与权力》一书中，通过全面细致地梳理美国 and 欧洲最近解密的档案材料，运用经济分析和国际关系理论，对战后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政治关系，特别是面对美国施加的金融压力，德国是如何保护政策自主权的问题，展开了精妙的论述。该著作的一个最大特色就在于，将国际货币和金融问题置于更为宏大的政治和战略背景中展开讨论，而不是就金融谈金融。

CONTENTS

Foreword

- 1 The Highest Strategy Is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Thought

- 5 Li Shenming / Mao Zedong's Strategic Thought of Keeping CPC and Regime from Corruption: Its Origin,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Related Thoughts

Interview

- 39 Yu Yongding / Do Not Forget the "Dollar Trap"

Monograph

- 53 Zhang Weiwei / Farewell to Political Romanticism: Thoughts on China's Reform
60 Jia Genliang / Strategic Conception of China's Postponing Joining GPA
70 Li Shimo / Speech to G20: Globalized 2.0 — Shared Interest and Divergent Models

Annual Report

- 75 Zhang Wenmu / Mid-East Turmoil and Complex World Situation

History

- 141 Liu Xiaofeng / Knowledge Advocation, Knowledge Objection and National Conception of "Cultural Community"
167 Han Yuhai / Austere Politics, Austere Civilization

Book Review

- 179 Da Wei / H. Kissinger: On China
186 Yan Rong / Francis J. Gavin: Gold, Dollars and Power

战略的最高境界是战略方向

国家竞争本质上是战略境界之争。战略的最高境界是战略方向。方向出了问题，南辕北辙的错误便会连绵不绝。“战略”往往是在缺乏方向的时候才频繁地为人们所提及，方向问题越被忽视，关于“战略”的谈论就会越多，与此同时，这些话题的战略价值也就越低。因而，社会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战略”问题的热情，未必是这本以战略研究为任务的出版物面世的理由；那些基于方向感的需要而对战略的思考，才是本出版物存在和发展的根基。

我们坚持的战略方向是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坚持的战略原则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国人民近现代救亡图存的历史经验反复表明，这两条是中国未来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基础，是中华民族独立于民族之林的基石。这也是我们对战略问题多样化讨论遵循的基线。

战略方向关乎民族命运。所有着眼长远的战略问题，都会涉及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生死问题。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无效的空谈显得何等苍白。我们强调方向的重要性，并非主张那种毫无生死紧迫感却纠结于“方向”的夸夸其谈，而是希望在具体问题的战略分析中确立方向感，展开有方向的务实的战略分析。

17世纪初，莎士比亚将“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摆到已来到世界新文明门槛的英国人面前，英国人民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随后的工业革命，在解决英国面临的历史难题中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20世纪初，中国人民在世界新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门槛前也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初步解决了中国面临的历史难题，并由此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今天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此深刻地卷入了世界，中国也开始了从一个地区性的国家向世界性的国家转变的新征程，“生存还是毁灭”仍将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再次摆在中国人面前，并需要我们用新的方法去解决。

我们坚持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力戒空谈”的延安学风。

马克思在那篇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文章的任务重在解决问题，而不重在解释问题。对问题的解释可以有千万种，乃至无限多种，而能用于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只能是少数几种，正如人饱时会对“饥饿”的解释有千万种，而当自己真正感到饥饿时，能解决问题的方案可能只有几种乃至一种。没有问题意识、不用于解决问题的云雾般的解释，不管其逻辑如何严密，如列宁所说“它无疑的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是没有实质意义的。面对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写出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文章，就是我们需要的文章。

THOUGHT



5 李慎明 / 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
.....
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
.....

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李慎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研究员

本文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为依据，梳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实践，对毛泽东晚年的探索与失误做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以对我们现在的工作特别是确保实现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有所启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可能是一个难以讲清的大题目。因此，探讨这一问题，一是需要用一定的篇幅，二是有时也须引用一些必要的文献，三是笔者只能从自己所接触到的有限材料进行梳理和认识。由此给读者带来的不便甚至偏颇，敬请大家谅解与指正。

一、“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概念的提出

“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这一概念，主要反映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但也同时包括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保持党和军队、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之所以只提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而没有把军队单列出来，是因为广义上的政权概念，已经包括了军队。至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这一概念提法本身是否完全科学准确，当然还可以探讨，但这一战略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决议》在“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部分中明确指出“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¹的表述，其实质，就是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

1.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2页。

梳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实践，也应遵照《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做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本文提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这一概念，就是根据《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进行的提炼，是经过多次推敲确立的。其中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这一提法源自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决议》中说：“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办法。”²“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这一提法源自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邓小平说：“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这一提法的依据来自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的谈话。邓小平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⁴“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⁵邓小平这一论述十分重要，这就坚定地划清了与苏共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全盘否定斯大林进而逐渐脱离、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界限。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⁶，但“从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这也就是说，这一严重错误是在探索确保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中的失误，同时也可以说是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过程中的失误。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经过多次曲折，最终实现的第一次成功的结合。我们党在新中国建立后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相结合；在第二次探索中，毛泽东带领我们党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但也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失误，但这样的失误毕竟是探索中的失误。因此，本文提出“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一概念，是符合《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

2.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第811页。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页。

4. 同上书，第346页。

5. 同上书，第347页。

6.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第825页。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是在探索确保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中的失误，是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过程中的失误。

的。其中的“实事求是”是指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其中的“恰如其分”是指具体运用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评价“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这两个词并不是同意语的重复。

什么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决议》明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多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⁷可以说，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就是我们党《决议》中所说的有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我们党是如何给“文化大革命”定性的呢？《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⁸“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做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

7.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第808-809页。

8. 同上书，第809-810页。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才有此后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

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⁹《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十分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说，有此定性，我们党才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¹⁰才有此后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

毛泽东本人是如何看待自己一生，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呢？1976年6月13日，病重的毛泽东对华国锋等四位守护在自己身边的政治局委员交代后事时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在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¹¹

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把对自己一生的评价简化为“两件事”，是有一定道理的。“两件事”中的第一件，也就是建立新中国，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持异议的人不多”。对于这件事，也可以说，从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来讲，完全可以“定论”。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极少数人仍会企图推翻这个“定论”。而绝大多数人也会全力维护这个“定论”。对建立新中国的评价，国际上也会有不同的反应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围绕对建立新中国评价的争锋，也可能还会延续不少年。至于“两件事”中的第二件，也就是毛泽东所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他自己所说：“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从这点上看，在晚年，在如何判断大家对自己所做的第二件事的认可度上，毛泽东是清醒的，他这一判断也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围绕对第二件事的评价，绝大部分同志依然拥护和维护1981年《决议》精神；但毋庸讳言，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看法，甚至展开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会延续不少年月，甚至也可以说，直到阶级的完全消亡。

《决议》在给“文化大革命”定性的同时还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

9.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第811页

10. 同上书，第821页。

11.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1-1782页。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的。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¹²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¹³

《决议》的做出，距今已整整30年。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有着种种评说。这些年来，国际国内的实践充分说明，当年邓小平和我们党的《决议》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机的评价完全正确。此后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党中央和邓小平当年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试想，若是当年我们党像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一样对待毛泽东，很难想象今日之中国，会是什么局面。实践也已经证明，那些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所谓“个人权力之争”甚至“个人品质问题”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据笔者所知，当年有此误解的同志中，现在有不少人已完全转变了自己当年原有的看法。

维护《决议》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准确、正确的评价，要反对两种倾向，这就是《决议》中所指出的：“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¹⁴上述两种态度，都不是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

“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今已经45年了；不知不觉，已占我们党成立的一半时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33年前的上述讲话，梳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

12.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第814-815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9页。

14.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36-837页。

把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这一科学论断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严格区别开来，把毛泽东晚年探索和思考当中的正确成分与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严格区别开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实践，对毛泽东晚年的探索与失误做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把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这一科学论断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严格区别开来，把毛泽东晚年探索和思考当中的正确成分与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严格区别开来，从而牢牢记取“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避免“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进一步科学、全面、准确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进一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

近些年，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和国内改革的持续深入，使笔者更加感到理论的重要。但坚持和发展正确理论的前提，是正确对待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讲，世界上只有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科学。近些年，笔者又重温了党史，更加感到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在新中国成立后到1956年基本完成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以及从这时开始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同时，也对1957年反右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所犯错误进行了相关思考。思考中，总有这样一个问题盘桓在自己的脑际：在一个相当长的党的各个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毛泽东的功绩为何像一座座巍峨的高山接踵而至，让人目不暇接；而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毛泽东的种种错误为何突然涌显，让人扼腕叹息，反差如此之大，如夏冬意外之衔接，让人不可思议呢？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也不是。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实践中来。

近些年笔者又想，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那么，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能不能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呢？或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呢？笔者认为同样不是，人的错误思想的来源也只能是社会实践。只不过，正确思想是对社会实践正确的反映，错误思想则是对社会实践的错误反映。

如果说，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同样是来自社会实践的话，那么，其肇端发始于何时何由？探寻此思想发生、发展和演化的轨迹，无疑有助于认识我们时代的变迁和毛泽东的心路历程。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理论家。在